

旅居馬尼拉的生命經驗

黃慧瑜 博士生、自由工作者

流浪國家：菲律賓

流浪者計畫：

走訪馬尼拉布拉坎省等地的佔屋運動，探訪都市貧民的處境與生存策略



日常

2021年初的 covid 疫情還未蔓延全球之際，我在馬尼拉奎松市的都市貧民社區旅居了三個月。因著特殊的時間點，我的旅行經驗充滿計畫外的變動，前期多是日常生活的文化衝擊，最後一個月的馬尼拉開始實施隔離政策，我第一次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準戒嚴」的氛圍。

初來乍到，計程車司機花了五小時從 NAIA 機場開車載我到距離只有十六公里的錫蒂奧聖羅克社區（Sitio San Roque）。大馬尼拉 NCR（菲律賓首都地區，包含馬尼拉在內共十六個城市）是超過一千三百萬人口，面積比新北市還小的都市。由於馬尼拉不是觀光區域，長期以居民習慣建立起來的當地公交系統極度複雜和擁擠，我花了兩個月才稍微適應馬尼拉的交通系統。

至今仍然覺得我離開前見到馬尼拉街道那空無一人的光景，簡直可以用另外一個世界來形容。

日常交通的文化衝擊是這樣的：我在 google 地圖上目測徒步半小時可到的距離，實際上經常因為沒有人行道或無法跨越馬路而不能步行；我總是需要居民引路才能找到貧民社區的入口；當地居民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jeepney，因為站點複雜，還有攔車、跳車等文化特色，沒有懂英文的當地朋友帶，幾乎不可能學會；好在當地的 angkas 是一種非常好上手的摩托計程車，在我學會搭 jeepney 以前都靠它。初到社區的那幾個月，當地交的朋友總是喜歡聽我分享我被隨處可見的蟑螂嚇壞、被路面突起的鋼筋或坑洞絆倒、天天腹瀉之類的日常，然後樂不可支的告訴我「歡迎來到馬尼拉」。

T 是 kadamay 貧民組織的一員，他花了兩周在貧民社區鄰近的迪里曼（diliman）設置的 camp 為我上歷史課；他同樣為正在準備抗爭的貧民社區居民們上課，講述菲律賓的殖民史。為抗爭者上歷史課是 kadamay 協助社區型的組織發展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基礎。T 向我解釋，菲律賓是一個 semi-colony 狀態的國家，軍事、經濟、文化都受到以美國和中國為主的控制，因此抗爭社區中的歷史課程有種帶著居民重新「認識菲律賓人、成為菲律賓人」的面向自由和平等的教育性。

話說回來，相比於習慣野營的組織者和居民們，我的外地人拙樣反差巨大。T 穿著輕便，不管在哪裡都是夾腳拖，坐在漫天飛舞的大蚊子裡一派從容；而我上課的樣子一全身塗滿歐護防蚊液，長袖長褲外加防水外套、防水靴，全身緊繃的坐在樹叢中的塑膠小凳子上，想辦法跟上 T 的飛速英文講解，邊打蚊子邊打筆記。

馬尼拉和貧民社區的生活對我來說並不容易適應。如果不是貧民組織的行動者們耐心又包容的歡迎我，我可能很難靠自己感受到當地的魅力。貧民社區和馬尼拉市區有一種雜亂無章、喧鬧擁擠卻又不可思議的親和的魅力，我想那大概是多數我遇見的菲律賓人身上具有的隨機應變和樂觀的魅力。

那樣的生命特質是只待三個月的我難以形容的。貧民社區長年抵抗著大型開發案的迫遷壓力；各式各樣的遊行抗爭通常只有組織作為自己的媒體，卻可以在道具和形式上展現細緻和強大的創造力；在我回台灣以後，看著奎松市區的社區行動者們在 covid 蔓延之際慢慢發展出貧民社區的社區菜園、公共廚房等在隔離政策下因應而生的生存網絡，我想現在我會這麼形容：那是對追求解放和平等有強烈意識的人們獨有的創造力。

逃離

三月開始的 COVID 是沒有人可以旁觀的劇烈轉折。在我還笨拙地設法習慣日常的時候，迅雷不及掩耳暴風般開展的疫情就席捲了日常。

在離開馬尼拉的前兩周，菲律賓內閣開始發布一系列隔離政策。由於菲律賓內閣的政策變動頻率很高，當地人在網路不普及的狀態下不容易即時更新資訊。臨時擔當起資訊中轉站的我在旅館、社區裡起了一點作用，那是我在馬尼拉真正覺得自己融入他人日常的開始。離開馬尼拉的前兩周，我通常每晚摘要當天內閣記者會的資訊，也會協助調度跨國物資，有空閒時甚至就搭著 jeepney 或 angkas 去超市觀察物資和人流—不知不覺中，我與旅館的工作人員和社區朋友距離越來越近，那是我切身感受到我與他人之間的親密感、焦慮與恐懼的契機。

二零二零年三月六日，首都 NCR 部分城市開始實施社區隔離政策；十二日，整個 NCR 宣布封城（lockdown），物資恐慌約隔兩天爆發；三月十六日，菲律賓內閣晚上八點召開臨時記者會，宣布二十日起停止營運往返呂宋島的國際線、國內線班機。但實際上 NAIA 機場內外塞得水洩不通、出現無法撤離而滯留機場的逃難潮是在兩天後，也就是我離開的十八日才開始。

離開的最後一晚，我趕在七點宵禁前到隔壁巷口的超商買兩瓶當地啤酒，回到房間喝兩大口，直到感覺神經和肌肉開始鬆弛，然後走到頂樓，在陽台邊凝視夜晚的 kamuning 街道。旅館外新增了一個檢查哨，大約兩個街區就設有一個，附帶七八個荷槍實彈的軍警。平日不分晝夜總是喧囂的 kamuning 街道如今一片寂靜；平日最擁擠的主要幹道 Quezon Ave 也是一片寂靜。

由於所有公共交通都被迫停駛了，計程車也無法營運，要經過主要幹道上一路十幾個檢查哨都得出示通行證—電子機票是其中一種。拖了旅館老闆開車接送的福，我十八號早上十點就抵達 NAIA 機場。

塞爆撤離人潮的 NAIA 機場看不到動線，顯然失控了，恐慌在人群中蔓延開來。當天班機時刻表顯示全部的班機正常起降，但實際上有大批旅客無法在飛機起飛之前通過海關；也有旅客在航空公司櫃

檯買不到當天離境的機票，被迫滯留機場外圍露宿，而 NAIA 第一航廈往外延伸可步行抵達的區域沒有旅館營業，也沒有可營運的公共交通。

我買了下午三點的華航班機，但在那一片混亂之中我超過三點才通過海關。恐懼和求生慾望讓我舉起雙手對著海關前的荷槍警察不斷地大吼班機和時間，在沒有檢查隨身行李的狀態下直接闖過了海關再一路飛奔到登機口。實際上當天的班機都延遲了，只是機場無法更新時刻表。在我搭乘的班機起飛之際，機上還有目測接近四分之一的空位，但當天那班華航的機票前一晚就已經售光。

我從 NAIA 機場離開那天大約傍晚抵台。離開的我當時遙望馬尼拉有種死寂感，猶如丟下了朋友逃難的罪惡感；但如今回想那一切在貧民社區所有生機勃勃的人事物，我想我當時覺得真正失去的是與他們分享親密與痛苦的資格。

「有一天我會再回去」我仍然這麼希望。



馬尼拉奎松市的 Sitio San Roque 聖羅克都市貧民社區，圖為社區外少數有燈光的入口；入口內的社區腹地原有約 24,500 家戶，目前僅存約十分之一。聖羅克社區自 2010 年以來因為 Vertis North 商業興建計畫而遭受迫遷。十年來，聖羅克社區雖持續有居民受迫遷，仍然形成緊密的生命共同體。

破碎的田野 漫長的流浪

吳偉民 維摩舍出版企畫

旅行國家：台灣蘭嶼

旅行計畫：探索水的形態和島嶼的關係，學習人與自然的連結。



風停留的地方

疫情之中開展的流浪，不只時間上從兩個月延伸成這兩年陸續片段的駐留。周而復始地往來，也見證不少小島難得的寧靜日常，以及許多文化衝擊和意料之外。儘管有時期待有時顛簸有時不安，但每每經過一整天舟車勞頓後，在港口或路上被叫住的那一聲「回來了喔！」心中總還是會充滿溫暖的感受。



左圖：Vanwa（灘頭），深諳水性的達悟族孩童，即使身著衣褲也可自在地在海裡移動。



右圖：Iranmeylek（東清部落）灘頭，傳統與現代並存，機動船、拼板舟、sup立槳及戲水孩童共享這片海域。

2020年2月，正當全世界的關注都圍繞在一個還無法定義的疫情時，我悄悄地抵達了蘭嶼。此刻小島是寂靜沉默的，有時行經部落之間都還遇不上一個人，能見的除了不須防範遊客的閒散家犬，以及不論在岸邊、叢林、山壁都能以離奇姿勢站立的羊群之外，就是各戶緊閉的門窗了。看起來都像板著一張臉在說：這裡不歡迎東北季風和閒雜人等！

也是，究竟誰會沒事選擇在這樣緊繃的時刻來蘭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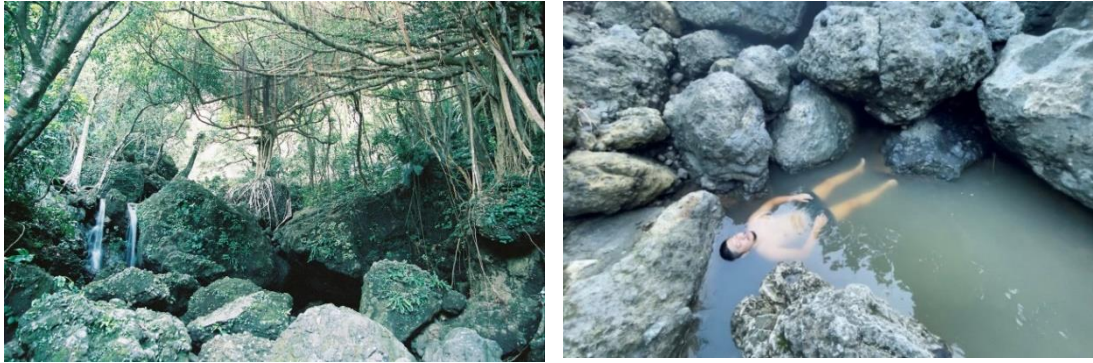
月亮的背面

達悟夜曆的月圓（Tazanganay）這日，遇到來島上之後第一次的停電。走到戶外，發現大家也出門散步或在屋頂上待著，沒有感受到什麼焦慮、抱怨或緊張的氣息，更多的是自得其樂吧。在接近全黑的路上行走，是種些微恐懼緊張卻又新奇的體驗，反倒是動物們熱鬧得很，蟲鳴雞啼狗叫的。除了偶爾經過的車子閃著忽明忽滅的燈，就是海面的粼粼波光與天空的眼睛，襯著遠方拍打礁岩的碎浪聲。

想起2013年拜訪了James Turrell在直島南寺的作品「Backside of the Moon」。穿過庭院和長廊，排著隊伍走入建築內部後，持續前進、轉彎，看著前人的後腦勺、背部直到腳跟，慢慢隱沒在漸深的黑暗中，只能專注地聽從導覽人員指示，扶牆摸黑坐下，然後等待。在時間幾乎停滯的氛圍裡，下意識地眯起眼睛試圖看清楚前方，瞳孔卻無法調節對焦。過了許久眼前漸漸顯現一方淡藍色光幕，像從遠方的牆面滲透出來，伸出手試圖測量遠近，卻也難以揣測實際距離。直到全然適應後，竟也能看見空間裡的其他人了。而那片藍原來一直都存在著，如同月亮的背面，即使身在地球的我們看不見。電來了，村子又回到日常的運作，那些細微窸窣的聲響也漸漸消失。像是那件在黑暗中的作品，一直都在，只需要安靜等待，就能領會。不要試著詮釋，去感受。

白浪海嘯環島吧

不論出發前或抵達後，許多台灣和蘭嶼朋友聽聞後，第一個問題通常是：「為什麼選擇去／來蘭嶼？而且……流浪？」句尾往往搭配一股懷疑且上揚的口音，以及試圖壓抑驚訝的眼神。透過這些跡象顯示這並不是一個真正令我的朋友們感到困惑的問題，而是認為蘭嶼似乎和「流浪」沒有關係。這樣的回饋反而讓我暗自竊喜，沉浸在自以為只有自己才能體會箇中滋味的傲慢裡；接著第二個問題會是：「那你去／來蘭嶼實際上要做什麼？」通常我會視對方的好奇心及耐心程度，分別給出五分鐘、十分鐘長度不等的回答。其中有正經八百的官方版本，也有不切實際的浪漫冒險，以及純粹滿足自己的個人實踐。可是每當我坐在桌前，試圖將散亂無章的筆記、照片彙整成有系統和脈絡的書寫時，腦海最常浮現的問題卻是一一「你究竟有什麼好流浪的？」儘管經歷了許多快樂、充實而豐盛的事，過程仍然有著無法言說的孤獨、失落及痛苦，直到現在，我想我還在學習如何回答這個簡單卻又複雜的問題。



Lidunala（意為從山上降下水的地方），源頭來自大天池的瀑布。

閒來無事時，和部落朋友最常做的就是環島了。白天、夜晚、晴天、雨天，隨時都可以出發；向左轉向右轉、走公路走山路，隨時也都可以停下。在環島中慢慢探索發現各個部落的文化性格差異，部落之間的邊界也充滿各種可能性和突發狀況，也有著禁忌和隱藏據點。有時這些邊界變成了主體，除了界定部落秩序的基礎，邊界的風景也往往多元而迷人，既渾沌又自由。2015年跟隨 NGO 組織到尼泊爾震災時，經歷了第一次陸地過境。從尼泊爾到印度，邊界是一座橋，橋上是來往兩國之間的行人、車伕與巴士；橋下是沿著草原河畔游牧的人與牛羊。這對於當時的我來說相當震撼，邊界的概念瞬間消失了，一棟建築物或一道圍牆，甚至是一個招牌，就是不同的國家。對於海島環境的台灣來說，海洋就是我們與其他國家的邊境，但在文化習俗裡，卻常以封閉或危險的心態看待，海洋同時也應該是連結的通道。接觸自然環境，是最能帶給人類體驗到自由和開放的。

除了環島，部落定期有各種大大小小的祭儀典禮進行，但往往不會有明確的時程表，又或許因為我是外人無法得知，「大概這幾天吧」、「可能後天」，幾次經驗下來，總能從周遭環境和走動的人觀察出一些跡象，談話的語言密度也會有微妙變化，然後在某個清晨就會被喚起。

「快起來，要殺豬了。」聽起來彷彿只是一件尋常不過的事，過程卻是莊嚴肅穆，沒有人嬉鬧或竄動，行禮的人精準地將匕首插入豬牲右前肢下方，只聽見悶哼後的一聲短啼，沒多久就停止掙扎了，一旁的羊隻也已明白自己接下來的遭遇而顯得躁動不安。跟隨新船下水，回望灘頭前方的淺海區域，除了玩水的孩子們，還有載客浮潛、漁釣的動力船，傳統拼板舟體驗，遠方還有衝浪和划 sup 立槳的人。駛向外海，無浪無風，沒有任何裝備的跳進海中，潛下深邃藍黑不見底的海，全然感受海洋的起伏波動，覺察海浪動態的脾氣，只剩下自己的心跳聲，和口中吐出的微小氣泡，就這樣靜靜地漂浮著。



左圖：Bobosan（上山下海出入口），朗島部落發起以達悟語、漢語對照，推動地景正名。
右圖：Imowrod（紅頭部落）睽違十年舉行的 Apiya Vehan（好月節—小米豐收祭）

後疫情時代，人們紛紛走向自然，大島登山、小島潛海。達悟族世代與海共存，但並不是挑戰海、戰勝海，海洋不是極限，而是日常。大至海洋潮汐，小至每日用水，不同的水有不同命名，也是建構真實部落的地景命名：取水處、像水渠、最大的河流、上山下海出入口等。族人的生活與生命跟著海洋流動，面對著海洋。這裡是島國的邊界，也是漢人文化與海洋文化的邊界。

日久他鄉是故鄉

在小島往往消息不出半天就能傳到島的另一端，和誰一起出入、去了哪裡，成了彼此互通有無的話題。一件軍綠色上衣「農用」，成了我在蘭嶼的代名詞。我非常樂見這個標籤貼在我身上，除了方便我在群體中被接納及介紹，進而以一種親暱的方式出場，也開始可以辨識那些沒說出口的省略停頓，意味著的默契和秘密，不需也不可言說的沉默。不自覺同化的口語腔調，身體在陌生的環境裡也能夠自在放鬆，學會暫時放下自己的計劃，不再想著需要見到什麼人，完成什麼目標。因此我也愈來愈無法客觀的看待部落許多的待人接物，每當我在某些話題中，感覺靠得部落的人更近了些，部分個人原則和價值觀就得先放一邊，才有進一步互相了解的空間。只有將議題放在不同的文化價值去理解時，才可能嘗試從不同角度學習，於是愈身兼多重的角色，灰色模糊地帶就愈大。

2014年初來乍到觀光客、2020年成了小幫手，2021年成為蘭嶼居民。往返近十趟，每次停留一周至一個月不等，加總起來四個多月的日子裡，我的流浪拼拼湊湊，偶爾在背包的深處夾層，不小心翻找到了一張票根或紙屑，就會陷入那些移動的片段。總結我的流浪，最後似乎只是得到一個老掉牙的結論——其實我們沒有那麼不一樣。

想著海洋、野溪、港灣，那些看海的日子；在夜裡說起小島的傳說、文化、歷史。開元港來去的旅人、東清夜市的攤販、吹過隧道口的風、秋天蘆葦滿山、五孔洞山坡上的羊、kaminan 在田裡的作務、maran 划船的身影。想著當我們與他人生命在一起時，一次對話，一場相遇，一次行動，一種公共性參與，就能重新連結起人與自然的可能性，Ayo!



左圖：飛魚汛期外，經常能見到在各種地形險峻的岸邊磯釣
右圖：Jyahawod（不易登陸之意），又稱軍艦島，東清部落傳統漁場